



利貞皇帝的冠服

讀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

■ 石釗釗

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是研究南詔大理物質文化的重要資料，其中服飾「頭囊」與「大蟲皮」極富大理特色，承襲南詔遺制。皇帝與官員所著袍服則受中原服飾文化影響，以不同章紋裝飾表現等級差異，為滇漢文化交流之佐證。本文考〈畫梵像〉卷中各類南詔大理風格服飾，在名物學研究中參考中原哀服章紋制度，以究不同章紋於大理服飾表現等級之差別，並藉此管窺大理國時期雲南地區先進的紡織印染工藝，展開一幅絢麗的大理國服飾繪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是現今所存大理國繪畫之瑰寶，其人物形象、山水背景、信仰構成等所包含的重要資訊，皆是研究大理國物質文化史的珍貴圖像資料。筆者於「國寶的形成——書畫菁華特展」中得識其真容，也就此展開對此卷的解讀，透過短焦鏡瀏覽細部、索尋蹤跡，得將畫家的創作歷程一覽無餘，其中人物服飾細節，尤對我們研究大理國物質文化史提供了寶貴的新知。

大理地區自西漢武帝（前 141- 前 87 在位）時期設大理郡始，即成為滇文化的發展中心。八世紀蒙舍詔在此地立國，當時西洱河地區的烏蠻共有六大部落，稱作「六詔」，而蒙舍詔在六詔中位置最南，故名「南詔」。自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第四代王皮羅閣建國，至昭宗天復二年（902）鄭買嗣滅南詔，建立大長和國，政權歷經十三代帝王，與唐朝往來頻繁。至五代後晉時期此地再度出現白蠻大理政權，高祖天福二年（937）段思平滅大義寧國，定都羊苴咩城，建國號「大理」，至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在大理置雲南行省，共歷二十二代帝王，國祚三百一十六年，其雄踞西南邊陲的統治橫跨兩宋時期。大理國不但繼承了南詔的政治版圖，並也如南詔與唐代的關係一般，與宋代有著密切的文化交流。在〈畫梵像〉卷第五十至五十四開所繪五位唐代或南詔時期的人物——神會、張惟忠、買純嵯、純陀、法光，證明了禪宗在唐代就已傳入雲南；卷中第一至六開的「利貞皇帝禮佛圖」中的人物服飾特徵很多受到中原文化的啟發，這些都是南詔、大理國文化受到唐、宋影響的例證。而需注意的是，不同於兩宋時期人物與山水畫科的成熟發展，以及文人畫風格興起的時代趨勢，〈畫梵像〉卷中的各種構圖要素都顯得頗為傳統，這可能肇因於早期佛教繪畫製作過程對「粉本」



圖1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第103開南詔帝后禮佛圖細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與「儀軌」的忠實性。

〈畫梵像〉卷首為黃紙清高宗皇帝御題詩，第一段綾隔水後是「利貞皇帝禮佛圖」，再間以托綾隔水，續接金剛繪像、如來降魔、青龍白虎、八大龍王、帝釋梵王、十六尊者、釋迦如來、諸祖師、維摩詰經變圖、南無釋迦牟尼佛會、藥師琉璃光佛會、旃檀佛、南無三會彌勒尊佛會、舍利寶塔、諸佛菩薩、觀音經變、諸天、寶幢、十六大國王眾（中有隔水）等，共計一百三十四開。除部分錯簡外，整體架構在



圖2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第5開利貞皇帝像細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重修裝池後並未有範圍的調整與變動，故呈現的畫面風格仍具一致性。此卷作於大理國宣宗功極皇帝段智興在位的「利貞」年間（1173-1176），描工張勝溫在這冊梵夾裝（現已改裝為手卷）的佛畫中，不僅描繪了當時帝王與貴族的「聖容」，還保留了南詔時期的帝后畫像。描繪最完整的當屬第一百〇三開「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共繪南詔國十三代國王及兩位皇后並附榜題名諱。（圖1）這些南詔時期帝后的服飾橫跨三種風格，並與大理國皇帝所著服飾有一定的承接關係。畫中第一代奇王細奴邏與第二代興宗王羅晟及其兩位皇后尋彌腳、夢諱的樸素裝扮，與現存日本藤井有鄰館的中興二年款〈南詔圖傳〉（南詔國觀音心化因）中兩代帝后的形象非常吻合。可見南詔在國力逐漸發展後，帝王服飾漸由早期樸素風格轉向隋唐缺胯袍和華麗頭囊進化，而後演進為前六開的「利貞皇帝禮佛圖」中的華麗袞服，¹顯示出大理國在服飾文化上的流傳與演變。而涉及研究南詔大理服飾風格的最主要材料分別為前六開「利貞皇帝禮佛圖」、第六十四開「南無釋迦牟尼佛會」、第八十一開「舍利寶塔」、第八十五開、第八十六開「建國（國）觀世音菩薩」及第一百〇三開「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利貞皇帝禮佛圖」段以折痕計共六開，上開窗榜題「利貞皇帝信畫」。按畫卷後明人宋濂（1310-1381）跋文稱「為利貞皇帝信畫」，但查原紙繪版框上下金剛杵欄完整，並無改動痕跡。此六開表現的大規模儀仗中，有導引、帝王與年幼的王子、文武官員、侍者與儀仗，這種行列儀仗式的構圖形式介於山東臨朐崖芬墓西壁壁畫〈出行圖〉與鞏義石窟〈帝后禮佛圖〉浮雕之間。²作為中心人物的利貞皇帝獨自擁有一對掌扇儀衛與童僕儀仗，在此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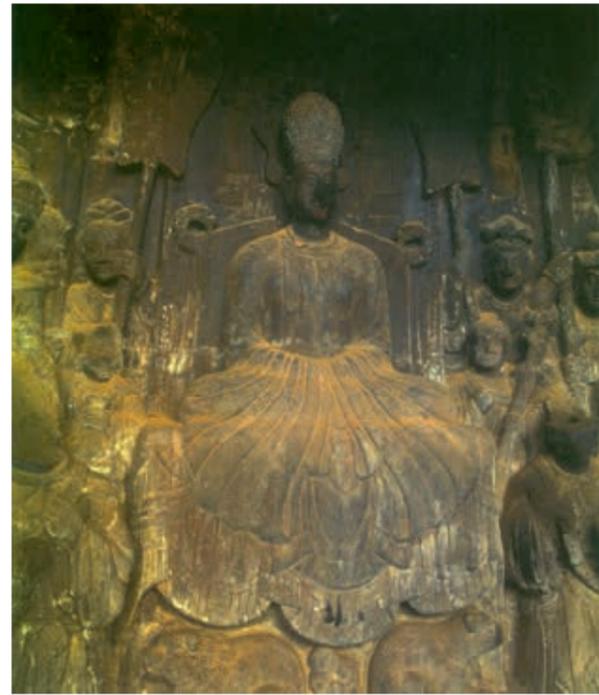


圖3 南詔 佚名 南詔第五世王閣羅鳳議政圖 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石窟寺雕塑·三》，2010，頁84。

以兩側留白方式將畫面分為導引、皇帝儀仗、文武官屬與儀衛兵士四組人物像。

手持蹲獅子鵝尾香爐的皇帝頭戴裝飾華麗的高大頭囊，身穿一件早期風格的重緣敞袖袞服。（圖2）頭囊是大理國有別於中原服飾文化的特殊首服，出現於〈畫梵像〉第五開「利貞皇帝像」、第六十四開「南無釋迦牟尼佛會」、第八十五開及第一百〇三開「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的「南詔帝后禮佛圖」中。唐樊綽《蠻書》卷八所記：「其蠻，丈夫一切披氈，其餘衣服略與漢同，唯頭囊特異耳。南詔以紅綾，其餘向下皆以皂綾絹。其制度取一幅物，近邊撮縫為角，刻木如檣蒲頭，實角中，總髮於腦後為一髻，即取頭囊都包裹頭髻上結之。羽儀以下及諸動有一切房甄別者，然後得頭囊。若子弟及四軍羅苴已下，則當額絡為一髻，不得戴囊角；當頂撮髮髻，並披氈皮。俗皆跣足，雖清平官、大軍將亦不以為恥。曹長以下，得繫金法苴。或有等第戰功獲



圖4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第6開開袍細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獎得繫者，不限常例。」³正與第八十五開及第一百〇三開「十一面觀世音菩薩」中的帝王華麗頭囊形象均相符，足見依照南詔大理的傳統，皇帝多配戴頭囊。今劍川石鐘山石窟石鐘寺區二號窟〈南詔第五世王閣羅鳳議政圖〉浮雕中（圖3），⁴有較為明確的正面頭囊形象，也可與〈畫梵像〉之側面頭囊形象相互佐證。

與華麗的頭囊相異的，是皇帝身後五人所佩戴的皂色花瓣狀裝飾高冠與花葉形高冠。（圖4）此類高冠亦見於第八十六開「建國（國）觀



圖5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第86開奉聖感靈通大王細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第103開昭成皇帝細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世音菩薩」（圖5）及第一百〇三開「十一面觀世音菩薩」中，色玄，有描金邊緣或金花裝飾，均與昭成皇帝勸券豐祐、孝哀中興皇帝舜化的華麗頭囊明顯有異，皆作「皂絹頭囊」。

〈畫梵像〉中的帝王服飾多展現為頭囊配合章紋袞服之服飾組合，不同於中原文化九旒冕或通天冠⁵配合袞服的冠冕穿搭禮服系統。冕服是標準的帝王禮服組合，最早的起源可上溯至周代，《周禮·司服》中即有「六冕」之稱，唯天子可服全。自漢代以降，歷經多次改制，冕服逐漸成為代表天子禮制典範的禮服，其所裝飾的采章制度也在明代最終完善。中原對於章紋的運用亦有等級之分，《後漢書·輿服下》載東漢初「天子、三公、九卿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黃下，乘輿備文，日

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以下）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以下）七章，皆備五采。」唐武德四年（621）朝廷發詔宣佈車輿、服裝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擬上」，違者治罪。故僅皇帝可服十二章，太子及一品服九章，二品服用七章，三品之服用五章，四品之服用三章，五品之服用一章。《春秋左氏傳》疏：「中國有禮儀之大，曰夏；有采章（冕服）之美，謂之華。」古稱華夏的由來，其實得益於采章冕服組合之華美。

利貞皇帝段智興（1172-1199 在位）所穿著的袞服沿襲唐代盤領袍服遺制，纁色。兩肩裝飾日月章文，下有兩升龍紋，胸前有星紋。腰間佉苴⁶處結紅帛綬帶，並垂飾描金組佩，在前襟下擺處還依稀可辨黼紋、黻紋與山紋。這些



圖7 西漢 T型帛畫 局部 日月章紋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取自《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1973，頁57。

章紋與尚色都是冕服制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且類似的冕服章紋也見於第一百〇三開「南詔帝后禮佛圖」中的第十代王昭成皇帝券（勸）豐祐身上。（圖6）兩者不同的是相較前者的繁複，昭成皇帝之冕服省略不少細節，只著重畫出兩肩的日月與升龍紋。

「文」與「章」通「紋彰」，是指袞服特有的裝飾紋樣。《尚書·皋陶謨》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語。又《禮記·明堂位》載有虞氏服載「夏後氏山，殷火，周龍章」，故《左傳·隱西元年》講：「昭文章，明貴賤」。利貞皇帝所穿袞服的上身，以日、月、星辰三種彩章紋裝飾，這三種章文都來自天相，故為皇帝所獨有，統稱為「三辰」，《周禮·神仕》載「掌三辰之法」，鄭玄注：「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細審〈畫梵像〉卷之日月章紋，可見紅色日章中有振翅鳥的形象，右側月輪中有樹與雲之描繪。自西漢以來三足鳥就大量出現在象徵日的繪畫中，尤以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帛畫之形象最為典型。⁷（圖7）現存大英博物館之敦煌藏經洞出土紙本彩畫中所見通天冠服皇帝肖像（圖8），⁸可依稀看到如〈畫梵像〉中的日月章紋。然雖日輪中皆有飛鳥，但月中樹下還不見雲氣紋樣。至五代時期莫高窟第九十八窟內〈于闐王供養像〉（圖9）⁹的冕服三辰中，日月章文與〈畫梵像〉中的形象



圖8 五代 維摩經變相圖 局部 冕服皇帝 敦煌藏經洞出土 31*.Ch.0054 大英博物館藏 出處見註8



圖9 五代 于闐王供養像 局部 國王李聖天冕服像 敦煌第九十八窟東壁南側 出處見註9



圖10 唐 閻立本 歷代帝王圖 局部 晉武帝司馬炎 波士頓美術館藏 出處見註12



圖11 宋 晁崇義 《新定三禮圖》卷1〈袞冕〉 冕服之龍紋與黻紋 宋淳熙二年鑄江府學刻公文指印本 出處見註11

最為接近，左肩日中飛鳥，右肩月中樹下雲繞。

「星辰」之「星」意為「五緯」，「辰」則為日、月、星三者統稱，為王者示民以時之所據，故曰「辰」。¹⁰ 袞服上較為明確的星章文，其記載出自《隋書·禮儀志》，概指星紋施於領下。星辰章紋分為兩類，一做散點狀分佈，二以直線連綴。〈畫梵像〉利貞皇帝袞服之星章為一星居中，四星十字交匯於中央的五星章紋，與波士頓美術館藏〈歷代帝王圖〉中「晉武帝司馬炎」蔽膝兩側緋色小綬之三星紋類，皆屬以單線連接的連綴星紋。（圖10）

龍紋是華夏民族的圖騰，自夏代起就大量出現在出土文物上，周代起即成為冕服章紋中最高等級的首章。根據鄭玄的記載，冕服上最早出現的龍紋可追溯到虞舜時期，《禮記·王制》孔穎達疏：「龍者，取其神化。」又龍與三辰者，《禮記·郊特牲》：「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孔穎達疏：「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長沙子彈庫楚墓曾出土人物御龍帛畫，其中龍的形象已經非常成熟。〈畫梵像〉中所見的龍章為盤曲的升龍紋，正合《周禮·司服》的鄭玄注：「袞，卷龍衣也。」此類袞服也見於莫高窟第九十八窟〈於闐王供養像〉以及宋淳熙二年《新定三禮圖》刻本中。¹¹（圖11）

利貞皇帝袞服的上身具表天象，下裳或屬寓意。黻紋似斧，¹²《尚書·益稷》孔安國注：「黻若斧形。」又《爾雅·釋器》：「斧謂之黻。」冕服中出現黻章，大意取其斷。《舊唐書·文苑傳上·楊炯》載：「黻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陳祥道《禮書》卷二亦曰：「黻即斧也，刃白而登黑，有專斷之義。」黻紋形似「亞」字，一指蔽膝通「韍」，二作綬帶通「紱」，三為青黑相次之「亞」形。冕服中有玄冕一類

只繡黻紋，按《周禮·司服》賈公彥疏：「黻，黑與青，為形則兩色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宋淳熙二年《新定三禮圖》與波士頓美術館藏唐閻立本（?-673）〈歷代帝王圖〉中「晉武帝司馬炎」之冕服黻紋對比，〈畫梵像〉無多少出入。

山紋多為山形，在中原冕服制度中，大多裝飾下裳外的蔽膝之上。而在大理國服飾中所謂下襪下緣的裝飾，與「三辰」天象對應，這與《荀子·勸學》中「積土成山，風雨興焉」¹³的說法不謀而合。《周禮·司服》賈公彥疏：「山取其人所仰視」，為去安定與仰其仁德之義。

黼章與黻章似不如「三辰」般表現皇權，也可服用於官員禮服，如「利貞皇帝禮佛圖」中還有五位清平官，雖也著裝飾章紋的盤領重緣敞袖袍服，但均無首章龍紋與天象「三辰」，僅在兩肩裝飾鳳鳥紋，並在下擺處裝飾黼章與山章。「清平官」自南詔起即為高等級官員，其官階近於中原之「宰相」，威權極重，下有「布變」、「久贊」等稱，復有「酋望」、「正酋望」則地位稍次，分掌各個執事部門。可見這些章紋雖不如龍與「三辰」般為帝王專用，但服用之人仍需官至上層。

在服飾尚色方面，「利貞皇帝禮佛圖」段中帝王服「纁」色，其他官服則大量使用了紫色、紅色與黃色，可謂「貴緋紫」。「纁色」《說文》卷十三上：「纁，淺絳也。」是指赤絳色而微黃，鄭玄注《周易》則謂：「黃而兼赤為纁」，即是畫中所見深紅泛黃橘的色相。玄衣纁裳大體來自天玄地黃之「玄衣黃裳」，「玄」、「纁」兩色是早期表達尊貴地位的服飾色彩中最為崇高者，所謂「玄衣纁裳」就是采章冕服的主體。（圖12）¹⁴ 與此風格相類者還有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北宋小楷書維摩詰經卷中〉，



圖12 初唐 維摩詰經變圖 局部 皇帝冕服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主室東壁 出處見註14



圖13 北宋 北宋小楷書維摩詰經卷中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出處見註15

此卷通幅紫絹地描金，間畫青綠，卷首殘留「維摩詰經變圖」之「問疾」段，畫作左上榜書題「南無維摩詰會」（圖13），卷尾紀年款「文治九年戊戌季冬旦日記」（1119），¹⁵ 均顯示紫色在當時的尊貴地位。宋歐陽修、宋祈《新唐書·南詔傳》記南詔：「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¹⁶ 而大理國作為承接南詔的段氏政權，也有符合白族服飾「貴朱紫二色和錦」的特點。

〈畫梵像〉卷所見南詔大理服飾風格除中原影響外，另有多處服飾細節表現大理時期的本



圖14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第4開身披大蟲皮之青年男子像 細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土特色，如利貞皇帝身後的第四開，頭戴兜鍪式華麗首服、身披「大蟲皮」之青年男子像。（圖14）兜鍪原為武將所戴之「冑」，卷中除「利貞皇帝禮佛圖」外，也見於第九開前景武將之鳳翅兜鍪、第一百〇三開「南詔帝后禮佛圖」景莊皇帝世隆之兜鍪。「大蟲皮」，有紅地錦緞貼裡包邊，製作講究。唐樊綽《蠻書》卷八〈蠻夷風俗

第八〉記南詔服飾：「貴緋紫兩色。得紫後，有大功則得錦。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後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功，則胸前得披，並缺其背。」¹⁷ 卷七〈雲南管內物產第七〉則載：「蠻王並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級波羅皮。」¹⁸ 其中所說的「波羅皮」亦稱「大蟲皮」，在南詔時期不僅用於賞賜重臣，也是帝王的服飾要素之一。〈南詔德化碑〉碑陰題名者全是賞錦袍、綾袍、紫袍金帶大蟲皮的清平官、大軍將、軍將等高級官員，大理國沿襲了這種制度，當可印證〈畫梵像〉中身披皮毛者應身份尊貴。

另畫中服飾繁複多彩的裝飾手法，也證明了大理國時期雲南地區已經掌握了非常先進的紡織印染工藝。《蠻書》卷七〈雲南管內物產第七〉云：「蠻地無桑，悉養柘蠶遶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幹數丈。二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為紡絲綾，亦織為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為上服。錦文頗有密緻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為衣服。其絹極篋，原細入色。製如衾被，庶賤男女，許以披之。」¹⁹ 可見當時的物質文化生產水準之高，已經足以承接服制上高水準的裝飾技法。

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為世人保存生動寫實的大理風貌，其中的構圖與服飾皆顯示出其與中原地區文化的相互影響，是研究大理國物質文化史最集大成的材料，其所含物象與題材之豐富，猶如一部南詔大理佛教文化史。雖創作題材橫跨南詔、大理兩個王朝，但因其對早期粉本或者祖本的忠實描繪，有幸保留了不少早於畫作完成年代的人物服飾形象。具有大理特色的頭囊與「大蟲皮」皆承襲南詔遺制，而裝飾有等級特色章紋的袞服則受中原的服飾制度影響，並通過服用章紋的多少來表

現不同等級，只有皇帝可服用象徵皇權的龍紋與「三辰」。筆者對其中服飾及其所表現的滇漢文明之交融等方面的解讀與研究，實為拋磚引玉，難窺其全貌，在此僅就所知略做討論，以嘆畫卷之珍矣！

作者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註釋

1. 本文研究對象中，漢族服飾有冕冠與袍服組合穿搭者合稱「冕服」，因大理國服飾不帶冕冠，故皇帝與高級官員袍服有章紋者稱「袞服」，袍服與頭冠組合稱「冠服」。
2. 臨胸崔芬墓西壁壁畫〈出行圖〉詳見臨胸縣博物館編，《北齊崔芬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16-18。鞏義石窟中的〈帝后禮佛圖〉共十八塊，其中典型為第一窟窟門兩側內壁〈帝后禮佛圖〉，較崔芬墓西壁壁畫〈出行圖〉已有明顯分組模式，更近似「利貞皇帝禮佛圖」之構圖。鞏義石窟細部圖像見金維諾、李裕群編，《中國美術全集·石窟寺雕塑·二》（北京：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2010），頁435-437。
3. 〈唐〉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8，〈蠻夷風俗第八〉，頁207。
4. 劍川石鐘山石窟石鐘寺區二號窟〈南詔第五世王閣羅風讓政圖〉的解讀見劉長久，〈雲南劍川石鐘山石窟內容總錄〉，《敦煌研究》，1995年1期，頁96-97；具體圖像參見金維諾、李裕群編，《中國美術全集·石窟寺雕塑·三》（北京：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2010），頁84。
5. 通天冠早期與袍服合稱「通天冠服」，具章紋且區分等級，之後逐漸演變為「朝服」，作為禮服用於大朝會、拜表等重大禮儀場合。
6. 法苴，〈唐〉樊綽《蠻書·蠻夷風俗》謂：「腰帶曰法苴。」《新唐書·南蠻傳上·南詔上》曰：「王親兵曰朱弩法苴。法苴，韋帶也。」另《新唐書·南蠻傳下·驃》有「金法苴」語。細審〈畫梵像〉之利貞皇帝法苴，雙層結構特別清晰，其組佩壓於兩層之間，似受中原冕服制度大帶革帶之影響。漢制冕服腰帶分大帶、革帶兩部分，革帶佩鞞，大帶加於革帶之上，兩帶同時服用。詳見〈唐〉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卷7，〈雲南管內物產第七〉，頁202。
7. 馬王堆一號漢墓與三號漢墓皆出「T」型帛畫，日中繪「金烏」，月中畫「銀蜃玉兔」，並在三號墓「T」型帛畫中出現紅點狀「星辰」。一號墓出土帛畫詳見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下冊，頁57；三號墓出土帛畫見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卷1，頁104-105。
8. 穿著肩繪日月紋樣的冕服形象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藏編號斯坦因繪畫31*.Ch.0054〈維摩經變相圖〉（1919,0101,0.31*），具備十世紀特徵。圖像詳見Roderick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5], 2: 53.
9. 〈于闐王供養像〉位於敦煌第九十八窟東壁南側，繪于闐國王李聖天冕服像。詳見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卷5，頁13。
10. 「星辰」之「星」亦作北斗，詳見王宇清，〈冕服章之研究〉，收入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華叢書·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文物叢刊·第一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6），頁43-48。
11. 冕服之龍紋與獸紋見《新定三禮圖·新定三禮圖卷第一》之「袞冕」，圖像詳見（宋）聶崇義集注，《新定三禮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據宋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公文指印本影印），卷20，頁13。
12. 黼紋見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藏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之「晉武帝司馬炎」段，參見Wu Tung, *Tales from the Land of Dragon: 1,000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997], 129-130.
13. 此說出自《尚書·益稷》（孔穎達疏），又山紋為采章者有《說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之說。古有崇山如「泰山封禪」、「仰其仁德」、「安靜養物」等說，《禮記·明堂位》（鄭玄注）：「山，取其仁可仰也。」，《禮記·王制》（孔穎達疏）：「山者，安靜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
14. 「玄衣纁裳」之帝王冕服形象有敦煌莫高窟初唐第220窟主室東壁〈維摩詰經變圖〉左下隅，皇帝首服冕冠，上衣冕服兩肩彩章日月與青綠山紋，兩側升龍章，蔽膝與下裳皆纁色。詳見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卷3，頁33。
15. 除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外，大理國繪畫還有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之〈北宋小楷書維摩詰經卷中〉，卷首作「南無維摩詰會」之「問疾」段中有少量大理國戴頭囊人物形象，卷尾題記云：「大理國相國公高泰明致心為大宋國奉使鐘□□造此維摩經一部」。詳見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ighth-Four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28-329.
16. 〈唐〉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卷8，〈蠻夷風俗第八〉，頁208。
17. 〈唐〉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卷8，〈蠻夷風俗第八〉，頁208。
18. 〈唐〉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卷7，〈雲南管內物產第七〉，頁174。
19. 〈唐〉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卷7，〈雲南管內物產第七〉，頁173-174。